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丛书

Between the Tradition and Reality

the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
古代文论研究

顾文豪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丛书

Between the Tradition and Reality

the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
古代文论研究

顾文豪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从全面和深入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得失成败做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评价,并给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衍变生成的一种解释,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探寻,更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完整的观照视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
文论研究 / 顾文豪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13-15226-8

I. ①在… II. ①顾…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论-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0628 号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

著 者: 顾文豪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谈 毅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5226-8/I

定 价: 5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3.5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9815625

目 录

导论：立足现实，扎根传统	1
第一章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	12
第一节 集部的“尾巴”	12
第二节 何谓“文学”	16
第三节 何谓“文学批评”	22
第四节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	29
第二章 从复古到求新	35
第一节 复古、循环与新变	35
第二节 进步的渴望	41
第三节 发明传统与再造历史	50
第四节 传统的“合法化”与文学典范的转移	58
第三章 从“科学”到“学科”	64
第一节 科学话语合法性的确立	65
第二节 整理国故：科学的方法与方法的科学	68
第三节 郑振铎：旧材料与新方法	78
第四节 朱自清：横向观照与中西相融	85
第五节 罗根泽：搜览与独创	91
第六节 从“科学”到“学科”	95

第四章 从求是趋向致用	9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构的历史起点	9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道合一传统的耦合	108
第三节 历史的革命性理解	114
第五章 人民本位与时代意识	124
第一节 时代意识与人民本位	126
第二节 有批判地在爱惜随园的羽毛	132
第三节 “我确实恨我过去五十年躲避了伟大的时代”	138
第六章 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古代文论研究:以现实主义为中心	150
第一节 现实主义:一种文化/政治的解决方案	151
第二节 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古代文论知识生产体系的建立	157
第三节 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中的体现	164
第七章 返本与开新	172
第一节 观念的反拨与转型	173
第二节 方法的翻新与运用	179
第三节 多元学术成果的取得	187
结语:谁之传统,怎样现代?	197
主要参考文献	201

导论： 立足现实，扎根传统

—

晚清著名文学刊物《小说林》创办人之一，编辑家、翻译家、小说家徐念慈，以笔名“东海觉我”撰写了一部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是书主人公法螺先生擅吹法螺，尤具科学精神，致力于打破陈规陋矩，不欲局限于诸家之说，而为一“学界之奴”。为此他殚精竭虑，苦思冥想，终致“脑筋紊乱，忘其所以”。灵智闷塞之时，忽一日他得神秘力量之助，竟能飞升上空，直攀三十六万尺之高山。而在狂飙突进的天宇驰骋之际，法螺先生亦灵、肉两分，各自飘荡——肉身坠落至地心，灵魂却莫名幻化为“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其光亮较之太阳亦要强万倍。

熠熠生辉的法螺先生御风而行，经天纬地，雄壮瑰奇，不可一世。当其途经欧美，光耀立刻引起科学界的震惊，众人纷纷嗟叹问询。而当法螺先生归返本邦，期待华夏子民同样有所震动时，等待他的却是国人的昏昧不醒——时值正午，全中国的人民正南窗高卧，鼾声阵阵呢！光亮抵过烈阳万倍的法螺先生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刺眼光芒，竟然根本掀不开国人昏沉惺忪的睡眠，而少数醒着的也不过是另一种“昏睡”——耽溺于阿芙蓉的袅袅烟云之中。

灵魂的光射不进中国人的心，那肉身之旅又是何等光景呢？

原来法螺先生的肉身驱壳跌落地心，最终掉在一老者的睡炕之上。老者并非凡夫俗子，实乃九百余岁的黄中祖。在他的带领下，法螺先生有幸进行了另一番诡异的地底之旅。在“外观室”的地球穹形天幕前，法螺先生只见天幕上的中国乌烟瘴气，随处可见吸食鸦片的国人，体质羸弱，萧索不堪。“内观镜室”更是奇景连连，室内陈列着各色瓶子，以此窥见各国人的“气质”。而中国人的“气质”中堪称优良者，百不得一，充斥烟毒吗啡者，则近七成，至于愚蠢、贪婪、迷信者，更是每不乏见。

由此,黄中祖喟然叹曰:“余与君现皆未睡,不知我子孙此时宵梦方酣也。余老矣,发音不亮,惜无人代余唤醒之耳。”^①

徐念慈笔下的法螺先生对于科学的念兹在兹,诚然在在透出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器物之学的暧昧之感,既充满好奇惊叹,又不乏畏惧惶惑,但我以为此篇小说更其具体地呈现了自晚清开始的大变动时代下的文化语境,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嬗变的复杂心绪。

显然,法螺先生的闭门苦思,或可理解为中国传统儒家格物致知的思考方式的体现,但究其愁苦的根由,则不妨说是对于时代变动中固有的知识资源乃至文化传统的有效性与其合法性的暗自怀疑。而当其灵肉分离,各自展开一段荒怪之旅时,更其吊诡分裂的内在景观也随之出现。灵魂因获致伟力而射放光芒,周游世界甚至星际奇航,观看到了大千世界最新奇有趣的科技剧情,但肉身却须洞见国人的诸般猥琐颓唐,换言之,灵魂或可凭借超自然的力量遨游太虚,肉身却不能须臾逃离现实的宰制。不妨再进一解,西方物质科学的昌明发达已使知识分子之“魂”莫名触动,甚至获致了某种超越体验,但他们的“身”不得已仍旧陷在本土势力的泥潭之中。以声、光、热、力为象征的现代化进程确乎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少数以黄中祖、法螺先生为象征的知识分子亦猛然惊觉,但国门内的大多数人一如鲁迅的“铁屋子”之喻,兀自昏睡不已。徐念慈凭借离奇的科幻故事书写出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代性开启阶段的最初的剧情与心情——时代的变动已然到来,西方的现代化力量在在可见,时势因应更是刻不容缓,可是仅凭“光之源”,而欠缺“声之原”,并不足以唤醒国民,唤醒中国。

是的,唤醒国民,唤醒中国,因为时移世易,更因为兵临城下,不容人不改弦更张,亟思良策。自晚清以降,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战败,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典范在西方船坚炮利的进击入侵下,轰然崩塌,不敷应对事变与世变。在中西文明的巨大差距面前,所谓“超稳定结构”^②的固有价值系统暴露出种种缺陷,传统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诘问。而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帝制一朝终结,同体依附的价值体系至此亦寿终正寝,全盘解体。政治秩序的瓦解,往往牵连到文化秩序的断裂,最终从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乃至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造成深刻的价值典范的转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于“变者天道也”的公理信奉,求新求变成为彼时知识分子的

① 关于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的解读,可参考王德威:《淆乱的视野——科幻奇谭》,《被压抑的现代性》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341页。

② 关于中国文化的“超稳定结构”的研究,可参考金观涛、刘青峰合著的《兴盛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以及《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等三部著作,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共同价值取向，而中国固有的知识、思想与文化信仰确乎已经无法提供给人们完足的价值资源，也无力进行有效的自我更新。

外部世界的山雨欲来，势必催生变革更易的时代需求。事实上，我们不必细说从头，晚清以降的求变之声仍旧言犹在耳。龚自珍疾言“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①，隐然成为那个时代的叛逆之音；冯桂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②，一改唯我独尊的中国式自大，开始正视西方的优越先进；康有为更明确表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③，将变革程度与国家存亡径相等价；而一生善变的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头一年即指出，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渡时代”，此前的数千年中国都处于“停顿时代”。在这变动不居的“过渡时代”里，不独政治上要造成“新政体”，学问上要酿成“新学界”，社会理想风俗上也要形成“新道德”。^④急切更新传统的殷殷求变之声，显然已成为自晚清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而当这一价值诉求日渐流播滋蔓，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群体意识，那么中国固有的思想、制度和知识谱系也就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大抵来说，这种转变在思想学术领域内有如下几大表现：

首先是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上的转变。当中国开始从“天下”走向“世界”，发现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尤其是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时，最先感受到的是文化自尊心的失落。在对西方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意结中，一方面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入侵凛然含怒，另一方面也对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世界饱含向往，由此形成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暧昧之情。但不论是视而不见的一味排拒还是改换门庭的渐趋迎合，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在于，传统的以儒家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受到了巨大冲击，几至解体。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力消失殆尽，但较之此前，则确实面临着纲常解纽、王道不再的尴尬局面。在这样的思想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为主要核心的传统学术文化经典也就很难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尤其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学术建制的日益完善，传统的经学霸权被消解，儒学传统及其所彰表的价值观亦一并脱弃冠冕，逐步转型成中性的学术形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日益渗透进来，虽然知识分子们尚未全盘西化，并且试图将西方学说置于中国传统思想脉络中加以把握，但至少自此开始，西方文化价值观念被逐步移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中，成为他们用以推动中国社

① 龚自珍：《上大学士书》，《定庵文集补编》卷二。

② 冯桂芬：《收贫民议》，《校邠庐抗议》卷上。

③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

④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30页。

会在政治、学术、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现代性进程的重要的价值典范。

其次是知识阶层的现代转型。如果说 1894 年之后的中国遭逢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这变局中的变局或是 1905 年的废除科举,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构成,促成了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①夏曾佑则更其深透地点出废科举对于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②大体言之,废除科举彻底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政治选拔模式,并且瓦解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使得此前一心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无法循此作升阶之谋,与政治权力中心渐趋疏远。仕途中断的读书人因此开始与初步兴起的报章媒介、现代学校或是社会组织相联系,转而通过这些社会媒介继续发挥政治文化影响力,以此传播现代思想,推进社会变革。政治上的日益边缘,社会身份上的游离无根^③,与借助现代传媒获得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传统士人从庙堂转型为奔走在江湖之间的现代知识分子,由此造成其思想往往在文化守成主义与激进反传统主义之间徘徊折返,而这也为日后中国思想进程中各种二元对立模式埋下伏笔。

其三则是传统知识制度的改变。学术思想的生产是不同时代下不同知识制度的产物。当整体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方式都发生本质改变,那么作为学术政治在知识领域的结果,关系到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知识制度自然也须随时而变。约略言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制度与科举制关联紧密,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谋位曳名,缺乏足够的学术自由和独立的价值标准,每与权力系统遥相呼应。晚清维新运动之后,现代传播媒介日益发达,报章杂志激增,现代出版事业亦蓬勃兴起,言论公共领域开始出现,加以借鉴西方学术体制的新式学校多有创建,终于造成了传统知识制度的现代转型,由此也拓展了新知识与新思想的传播渠道,为现代知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由是观之,无论是基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举入侵,还是中国本土社会政治文化系统的信用破产,无论是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主动移植,还是知识分子为因应时局而被动的弃绝传统,无论是西来刺激下的现代政治文化论域的出现,还是中国内部政治文化系统的自我调整,要之求变思进已然成为时代进程的价值主线,甚至时至今日,我们仍旧不能免却这一时代主题,仍旧在谋求通过诸种变革不断应和/

① 陈独秀:《答易宗夔》,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8 页。

② 夏曾佑:《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东方杂志》,1905 年第 11 期。

③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历史中发生的身份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的迁变,可参考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收录氏著《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三民书局 1992 年版。

迎合现代性进程。因此，唯有充分认识到晚清之后的时代变局，以及求新求变、寻求富强的时代意识对于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深远影响，才有可能使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去拨见更多历史的全相与初颜。

二

如果说西潮冲击下的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剧烈而频繁的变动，是知识分子所必须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基于其上的知识资源的解构与重构，则不妨视为是对晚清以降的严峻的中国现实与现实中国的一系列“回应”。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性进程中的社会变化所作出的精确而充分的描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自兹而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也濒临被消除的境地，突破了伦理中心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迫切希望“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原先那些看似“神圣的东西”都将被以现代和进步之名进行“褻渎”。

但“打破”和“褻渎”并不能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万宝全书。诚如林毓生正确指出的，中国新知识分子企图“藉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思想方式使得他们认为传统不过是一件可以全然抛弃的过时衣衫，但人总要穿衣蔽体，于是他们越是对传统这件“破衣烂衫”诟病骂，也就愈加渴望能用符合时代现实要求的意识形态来织就一件全新的外套。^②就如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的《本志宣言》中宣称的那样：“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③旧秩序一夕崩塌，知识分子不仅决心要抛弃旧观念，打倒旧偶像，他们所面临的更迫切的任务是主动因应世变，从政治、学术、文化与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造成新典范。换言之，回应现实的一大途径即不仅在打破传统，更在于透过与现实语境的若合符节来再造传统，因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404页。

②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陈独秀：《本志宣言》，《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40页。

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

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解构与重构是一个大哉问,非本书所能详加讨论。但如果我们认同文学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文化传统中的一大核心部分,“继承了沉重的伦理、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的任务”^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某种意义上将文学以及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塑视为是对于整体的文化传统的重构的一种具体表现。换言之,作为一项现代发明,文学始终被刻写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制度之中,因此我们有可能透过文学传统的演变与建构一窥整体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的变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强调文学与所在时代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并非意在否认文学本身的自律性。众所周知,文学始终存有一个二律背反,亦即它或与社会同声相应,也可能大唱反调,或追随时代变动,也有可能凝定不动,抑或成其先导。但这种相对主义并不妨碍我们从时代演变的视域中去发现文学传统的解构与重构,甚至恰恰因为这种不可名状的纷繁多变,才有可能让我们真正憬悟时代的善变与嬗变,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亦非按部就班。

本书的议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视域下对古代文论研究加以考察,虽然古代文论这一学术领域看似与现代并无太大关系,但事实上,作为古代“诗文评”传统的现代学术身份,其学科合法性仍然是因为“现代性”问题深刻地介入其中。质言之,古代文论研究所讨论观照的对象乃中国数千年积累而成的关于文学创作与文学认知的一系列精思卓见,就其客观的发生时间而言,确乎年湮代远,但古代文论研究真正区别于“诗文评”的一大特质,即是因着现代性的介入,其对古人的文学思考每能以新眼观旧书,时刻以现代知识公义去复核、检视、开显甚或规训古人的文学批评。

因此,与其他那些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创设出来的现代学科一样,古代文论研究同样不可能避免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以及现代性经验发生关系。正如刘禾将“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文学”定义为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认为这一文学的发展正“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也是“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③如果我们以刘禾的观点来观察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发生发展过程,那么将发现古代文论研究同样或可说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与自晚清开始的一连串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动进程遥相呼应。强调此点,并非意在贬低古代诗文评传统的落伍过时——事实上,对于古典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②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③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1页。

学认知的具体抉发，我们很可能反倒逊于古人——而是希望提请诸位注意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现代转型同样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不曾缺席，它同样需要对自晚清以来的历史语境中迭相而来的诸般“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而这一学科从教育制度的变化、知识谱系的建构乃至价值典范的确立等一系列转型步骤，毋宁也是现代中国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的花开一枝。遑论按照福柯的说法，学科本身就是权力“规训”的产物，学科合法性的确立以及自身体制的营构，在在都须依凭国家权威与制度性实践。

因此，如果我们认同古代文论研究学科与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关涉密切，也就能理解这一学科的现代转型不可避免地会与整体时代的现实问题彼此勾连，而其趋向现代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是对古代文论传统的一次重构。如此我们就能设法追问如下问题：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性进程是否同样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传统的具体认知？求新求变、寻求富强的时代呼声是否只是局限于中国的政经领域，它们之于古代文论研究是否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究竟是怎样介入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创作中去的，它与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博弈互动？具备现代学术品格的古代文论研究是如何观照中国文学批评的具体问题的，又是怎样确立自身文学典范的？往者已矣的古代作家与作品，为何有些人随事迁，沉埋故纸，有些却金身不坏，名垂青史，这方生方死的文学现象背后复杂的合法性过程的真相究竟如何？相较古人，今人的古代文论研究在方法论上有着怎样的变化与进步，不同的方法是否又会导致文学事相的不同认知？如果说文学是想象的一种方式，那么对于古代文学的想象又将在怎样的意义与层面开启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不同遐想？更重要的是，看似古今断裂的古代，是果真能与现代/现实秋毫不犯，各安其命，还是其实不安分的“现实”总能出其不意地更动乃至形塑我们对于传统的认知？

论者心知，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一一作答。但至少经由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才不会忽略晚清之后的中国的现实语境对于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总是作为时代背景而存在，事实上，现实的挤压与诘问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展开的文化土壤，甚至幻化为悬诸其上的无形标准。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省思，我们才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不致遗忘了簇拥在文学研究周边的各种文化力量，抑或将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简单粗糙地视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自然/必然环节。但这也不意味着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只是中国现实剧情的亦步亦趋，抑或说对于传统的解构与重构只是现实欲望的直接投射，而是希望透过古代文论研究这一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与转型过程的“历史化”，尤其是对其转型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建立的分析，最终揭示出现实与传统这两股力量究

竟如何互为博弈,同时试图发见古代文论与现实中国的内在联系,发见古代文论研究究竟在“制度化”过程中自我更新了什么,又自我规训了什么。

三

鲁迅曾形象地描绘过现代中国因着古今中外的交融互摄而导致的光怪陆离:“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①鲁迅的议论辛辣嘲讽,但其真确地点出了现代中国的纷繁多歧,不能划一,我们固然可以嘲笑彼时的洋不洋腔不腔,但更重要的是鲁迅在这种中西古今的杂陈中看到了现代中国的复杂性与包容性。

一切人是否都在“互相抱怨着过活”,我不确知。但现代中国社会的矛盾特质确乎由此可见,而这也提醒我们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观察的困难与审慎。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与文学研究的关涉,事实上也是头绪繁多。举凡制度的创设、观念的改易、语言的变革乃至文体的转换,凡此种种也未尝不是“都摩肩挨背的存在”着。因此,我们虽然深知晚近中国的现实语境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也明乎古代文论学科从确立到发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不啻是一番传统的再造,但如何寻找到两者之间的有效中介来加以考察,就成为本书的突破口和立足点。而在论者看来,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为研究视域,或许可以成为考察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角度。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而输入进来的。作为中国革命成功开展的思想纲领与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紧密地同中国社会的现实革命进程相联系。换言之,长久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从众生喧哗到多元归一的历史进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指导下发展以趋成熟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既是现代西方文化思想观念的外来成果,同时经过多年来的理论涵育与现实实践,最终也演变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学说和文论资源。也就是说,不论置诸历史实际还是理论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完全符合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并且准确揭示出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与文化思想之间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

① 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代文论，在其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凭借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巨大理论能量，激活了古代文论的自身活力，促进其转变为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的新文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充分说明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完全可以求取互动互融的共生关系，在保有古代文论的古典文化品性的前提下，经由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视域、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真正摆脱古人掌故闲谈，以资赏鉴的经验式言论形态，最终建构起符合现实语境，呼应现实要求的现代性文论体系。而这就使我们我们有理由认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视域来对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加以考察，是一种有效且可能的尝试。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每多歧变，与中国社会现实的交合程度大抵超乎一般的想象。本书不论从体量还是深度都势必无法完全涵容和厘析就中的种种衍变，这既无可能，也不必要。然而选择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选择的随机性。本书在对这一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时，既希望能切实直观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之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同时也希望能扩大视域，不照本宣科，而是尽量裸呈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历史演变轨迹，最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用以解决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危机的同时，亦确实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乃至决定性的影响，相应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在面对这种影响时也确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自我更新，形成了更其丰富和独特的文化特质。

基于如上考虑，本书试图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首先是关于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诚如黄人所言：“夫世运无不变，则文学也不能不随之而变。”^①传统“文学”观念因着时局的改变，西学的输入和现代学科制度的逐渐创设而发生了巨大改变。现代“文学”观念以及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与建构，最终导致了“文学”义界的重新确立，由此为研究者厘析出一条中国文学的新路线图进行了铺垫，也使得古代文论研究从传统集部中叨陪末座的“诗文评”演变为符合现代知识公义的文学批评。而这一全新的现代学术身份的获致过程并非自然行为，而是牵涉各种文化政治力量的互相角力，同时也顺应了晚清开始的知识谱系重构的时代进程。

其次则着重讨论作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时代思潮之一的进化论对于古代文论研究产生的影响。虽然中国的思想观念以复古论、循环论为尚，但

① 黄人：《中国文学史》，上海扶学轮社，第2页，本书未标注出版日期。

本书强调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仍然有对历史新变的关注。而从龚自珍、魏源以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进化论不仅成了他们念兹在兹的思想理论,也是他们试图援用于现实的一套危机解决方案,更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播导夫前路。通过现代知识分子的合力营构,进化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当进化论应用在古典文学与文论研究,则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衍变的阐述思维一转为以进化为进步,以复古为衰败的直线论述,从此文学史上的各种力量开始出现了优劣之别、先进与衰朽之别。但我们不能将进化论文学史观仅仅视为是中国对于西方思潮的被动回应,事实上,它同时也是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的传统“合法化”过程,是一次彻底的文学典范的价值转移。

与进化论的张扬桴鼓相应的则是“赛先生”的风头大盛。中国知识分子有感于传统学术研究观念并方法的落后与缺憾,希望通过对西方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引入来纠正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弊端。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郑振铎、朱自清、罗根泽等人试图通过新方法的运用,以开显传统文论的内蕴特质,本质上是一次汇融新观念的学术实践。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的一大观念基础,科学主义使得中国学者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发生深刻改变,而经由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路的理论演练与学术实践,也最终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由“科学”以至“学科”,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现代转型。

而不论是文学观念的转型、文学典范的转移,还是研究方法的更新,要之都在学术研究共同体内部进行变革。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并以其自身的理论魅力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理论范式,历史唯物主义以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以及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探索,极大冲击了千百年来儒家传统所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复杂性的揭示及其对于制约和塑造政治以及思想现象的社会空间的极度关注,使得原有的古代文论的阐释从泛道德化逐渐趋于对历史进程的革命性理解。而它的现实性、实践性及其对于现实生活采取干预态度的理论主张也与自来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颇为契合。因此,时人的古代文论研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量借鉴,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在中国的确立与张大。

而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地位的最终确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远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批评的建设与发展。而中国知识分子也从各自角度和领域出发,与其进行不同维度的思想对话,最终形成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导和主体的,同时由众多的创作者和批评者共同参与的一场革命和文艺的互动与对话。第五章试图以郭沫若与废名为例,就他们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做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对话,以及对于“时代意识”、“人民本位”的

努力呼应，来讨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特质与问题。

毫无疑问，建国后持续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尤其是1963年之后的文艺批评活动几乎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的常道与正道，成为彻底的政治斗争，文学政治化的趋势日益强烈。直到“新时期”开始，政治趋于理性清明，整个国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试图冲破此前“左”的束缚和禁区，文学创作与研究也开始重新谋求自身定位，文学的去政治化趋势进一步得到加强。就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而言，研究者们一方面对庸俗社会学和泛政治学的研究观念进行了痛定思痛的反思，力倡回归原典，回归传统，另一方面也不满足于简单地以古释古，力求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酌古今中外，在多方比较的视域下，为古代文论研究别开生面。由此分别从观念的反拨、研究方法的翻新、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探讨与革新，延拓了更多元的价值取向，开阔了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

本书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转型加以考察，不仅意在裸呈出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现实语境与思想背景，更意在提请诸位在注意文学研究独立的审美特质的同时，亦须关注其与中国现代历史经验的深密关系，在一个更其宽阔整全的研究视野中把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性的内在关联，以及晚近中国文学与整个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多重互动与丰富联系。

第一章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

——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

朱自清在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两书所写的评论《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采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①

在辞简意丰的评析中，朱先生告诉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之所以是在“五四”之后，因为那是一个“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新时代鼓励人们发现“新意念”，作出“新评价”，而“新意念”与“新评价”的纷然出现也反过来凸显和定义了时代的新。“从新估定一切价值”不仅成为一个创想，更成为一种可能，意欲对所在时代加以重新审视的企图配合着整个民族求新求变的迫切愿望，最终获致了一种极其巨大的解释能量，赋予人们全新的眼光去认知和裁断“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准此，提高中国文学批评的地位自是不言自明的了。

第一节 集部的“尾巴”

然则，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地位是怎样的呢？用朱自清文章里的另一句话说即是：“老名字代表一个附庸的地位和一个轻蔑的声音——‘诗文评’在目录学里只是集部的尾巴！”

大抵来说，中国目录学之成立，在西汉成帝之时。其时因典籍多有散亡，故在

^①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